



## 上海：一座城市拯救3万犹太难民

● 刘火雄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为逃避纳粹屠杀，数以万计的德国犹太人逃亡海外，但几乎所有欧美国家都紧闭国门，只有上海向他们敞开怀抱。期间，3万多名犹太人避难上海。以色列矗立着这样一座纪念碑，上面写道：中国人，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恩！

2011年8月26日，为期12天的“犹太难民与上海”展览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开幕。展览取材于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馆藏，配以19位主人公的亲身经历和近200张图片及实物。一张张斑驳的黑白照片，3万多名欧洲犹太人避难上海这段辛酸而温情的历史，见证了两国民众当年的患难与共。9月18日至10月30日，该展览移至汉诺威自由犹太团体文化中心举行。

### “水晶之夜”3万名犹太男子被捕

1933年初，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。作为狂热的种族主义者，希特勒曾在其《我的奋斗》中写道：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

是犹太人。他把犹太人看作世界的敌人、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、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。

希特勒上台之日，便是犹太人灾难之始。最初，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各方面的限制，剥夺其“公民权利”：在商场、学校、音乐厅等场所，“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标语随处可见；严禁犹太人与德国人通婚，禁止犹太家庭雇佣45岁以下的德国妇女；不许犹太人使用德国国旗……直至把犹太人“驱逐出境”。

1938年，纳粹德国接连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，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。11月7日，为了报复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，一名17岁的德籍犹太难民闯进德国驻法大使馆，连开三枪将一位德国外交官打死。当晚，希特勒得知消息后立即发话：“应当放手让冲锋队行动了！”第三帝国最疯狂的排犹运动汹涌而来。

从11月9日深夜到次日凌晨，在纳粹的怂恿和操纵下，德国各地的冲锋队（希特勒青年团）、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涌上街头，他们疯狂挥舞棍棒，所有的石头都砸向犹太人的商店：到处都是玻璃被打碎

的声音……

这一次突然袭击，致使 90 余名犹太人死亡，约 3 万名 16 岁至 60 岁的犹太男子在自己家里被捕，送往集中营；约 300 间犹太教堂损毁，超过 7000 间犹太商店、29 间百货公司被砸；奥地利也有 94 间犹太教堂遭到破坏。仅纳粹党徒砸毁的玻璃，损失就高达 600 万马克之巨，相当于比利时全国半年生产玻璃的总价值。破碎的玻璃在月光下像水晶般闪闪发光，这一夜因此被称为“水晶之夜”。破碎的“水晶”更像是犹太人的眼泪，无声地控诉着纳粹的暴行。



▲在上海提篮桥一带与中国居民杂处的犹太人

“水晶之夜”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。事件发生后的第 3 天，纳粹当局出炉新的制裁措施：迫使犹太人把焚毁的教堂清除干净，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人使用；强制每个犹太人佩带有“J”（德文、英文“犹太人”的首字母）字母的标记，以示侮辱；强迫受迫害的犹太人向纳粹赔偿 10 亿马克。德国《国家公报》公然宣布把犹太人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，并且剥夺他们的剩余财产，赶入犹太隔离区。

### “中国的辛德勒”发放“生命签证”

希特勒种族清洗的屠刀已经举起，犹太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他们不得不远走他国，开始流亡生活。当他们环顾四周，却发现向来以“文明”、“人道”自居的欧美多国国门紧闭，没有人愿意接收犹太难民。

美国移民名额有限，且要求申请人出具经济担保。英国在阿拉伯人的压力下，未敢放松犹太人前往英控巴勒斯坦地区的限制。在奥地利，当犹太人来到旅游局寻找庇护之时，办事官员拿出地球仪，指着一处处国家版

图说，这个国家禁止，那个国家谢绝。犹太难民绝望地问道：你有没有其他的地球仪？

正在这时，一位中国的“辛德勒”挺身而出，他就是何凤山。何凤山，湖南益阳人，曾公费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，获经济学博士学位。纳粹吞并奥地利、捕杀犹太人之时，他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奥地利维也纳外交官。

奥地利境内有近 20 万犹太人，纳粹想把他们赶尽杀绝。当局发出指令，只要犹太人马上离开奥地利，即可被释放。但要离开奥地利，首先得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。除中国总领事馆以外，17 岁的艾瑞克·高德陶伯把维也纳 50 多个领事馆都跑遍了，一个签证也没有拿到。何凤山不忍看着犹太人在维也纳等死，义无反顾地打开了向犹太人发放签证之门，目的地为上海。

这一消息在犹太人中迅速传开，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排着长龙。不少犹太人给何凤山下跪、送重礼。何凤山一一扶起，件件拒收，只是说：“这是天意……”几位少女围着他高呼：“爱神！”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经何凤山手拿到了去上海的



“生命签证”，他们来到上海，或从上海转道去了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地。

何凤山成批地给犹太人发放签证，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。纳粹以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财产为由，将其没收。何凤山自己掏腰包，迅速把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很小的房子里，坚持发放签证。究竟发出多少签证，何凤山本人没统计过。据幸存者手中的签证号码可知，到1938年10月，他已经发出了1900多份签证，这时距他到任仅5个月。但国内政界对是否向犹太人发放签证意见不一。蒋介石对纳粹德国抱有幻想，他使用德国军事顾问，购买德国武器。不久，何凤山被调离维也纳。后来，以色列政府授予何凤山“国际义人”荣誉称号，专门为他立碑，上面刻着“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”。

### 上海成了犹太人的“诺亚方舟”

世界之大，竟没有犹太人安身之地。1939年5月13日，931名德国籍犹太人登上“圣路易士”号轮船，从德国驶向美国，希望寻求庇护。在海上漂流多日后，多国拒绝停靠，轮船最终只能绝望地原路返回。

西方世界不愿引火烧身，希特勒更加有恃无恐，当年9月1日，德国纳粹以“闪电战”侵入波兰，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，六百万犹太人沦为纳粹“刀俎”上的“鱼肉”。反犹狂潮随即迅速席卷欧洲。

就在欧洲犹太难民无家可归之时，大洋彼岸的上海，为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升起了一艘“诺亚方舟”。上世纪30年代后期，由于日军侵占了非租界区，中国国民政府撤出，英法等国只在租界享有管辖权。一时间，上海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：无需签证和财产担保便可入境。这无疑让无望的犹太难民看到了再生的希望。

尽管纳粹当局允许部分犹太人离开德国，但要求他们随身携带的现款不得超过10

马克，违者一旦被发现，当即被搜去充公。不少犹太难民只得偷越国境，进入意大利、法国、比利时，再从那里的港口买高价船票，搭船抵达上海。

为了逃生，犹太难民想尽了办法。弗丽达·摩西带着三个孩子找到盖世太保，劈头就说：“请您给予我们全家避难许可，否则请现在就杀了我们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用您自己的手枪结束我们的生命。”或许是慑于弗丽达的决绝，纳粹当局竟然同意了她的避难许可。由于战事升级，大多数犹太难民前往上海的海路已被封锁。好在苏联和德国互不侵犯条约还有效，弗丽达乘上了前往海参崴的火车，然后搭乘日本轮船来到上海。密尔犹太经学院400名师生的经历更为传奇。早在纳粹闪击波兰前夕，经学院师生便陆续逃往立陶宛。随后，经学院师生取道苏联，途经日本神户。在无法获得赴美签证的情况下，师生一行最终获得入境上海的许可。他们于1941年分批抵达上海码头，没有一名师生掉队，甚至没有落下一册课本和一堂课。

### 日本拟在中国设立“犹太人居留地”

越来越多的犹太人逃亡到上海，这引起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的注意。他很快草拟了一份议案，提出“拟在西南边陲划定犹太（太）人寄居区域”，以便一劳永逸安置难民。因为在日军铁蹄践踏下，上海早已沦陷为“孤岛”，犹太难民衣食堪忧，处境不容乐观。

经国民政府行政院、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协商、论证，当局曾考虑于中缅边境的云南腾冲、蒙自两地划设犹太人特区。该地区物产丰饶，人口稀少，且靠近与英属缅甸相衔接的国际公路。无论欧洲或是滞留上海的犹太难民，经海路到达缅甸、泰国，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云南境内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也



提出：可以让犹太人从事土地开垦。由于蒋介石正集中精力指挥长沙、南昌等地的对日作战，他没有对孙科“划定犹太（太）人寄居区域”的议案拍板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政府一个代号“河豚”的计划正紧锣密鼓地推进。在日本人看来，富有的犹太人就像河豚，味道鲜美，但有剧毒，欲食其“美味”，必先去其“毒素”。日本为此专门秘密召开“五相会议”：日本首相、陆军大臣、外务大臣、海军大臣、大藏大臣共谋方案。

最终，“河豚计划”的要点定为：在日本占领下的伪满洲国或上海设立一处“犹太人居留地”，先安置三万名犹太难民，然后逐步扩大；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，由美国犹太财团承担，需一亿美元；借此改善与美、英等西方国家的关系。正是基于此种考虑，日军最初对涌入上海的犹太难民采取了默许态度，使他们暂时得以逃脱纳粹德国的迫害。

日本向美英等国抛出“绣球”，无非是获取战争经费的权宜之计。日本海军陆战队犬冢大佐负责所有的犹太人事务。他曾在公

开场合表示：“上海的犹太人，尤其是沙逊（号称远东第一首富），在上海有资金、有产业，而我国可能需要巨额资金来开发中国，因此重要的是仔细研究，我们怎样利用犹太人和利用到什么地步。”在日本人心中，犹太人意味着财富。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，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虐杀犹太人的仇恨，犹太富商耶柯勃·歌夫先后4次筹款赞助日本军队，总额达2000万美元。本已陷入困境的日本借此最终打败了沙俄。日本人坦言：没有歌夫的帮助，就没有日本的胜利。战后，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歌夫共进午餐。

1941年12月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美国对日宣战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“河豚计划”最终胎死腹中，上海这个自由港也被完全关闭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孤岛”。

### 提篮桥成了“小维也纳”

欧洲犹太难民到达上海时，大多身无分文，囊中如洗。他们先在虹口难民收容所落脚。当地许多学校、仓库和兵营被匆忙地改建成收容所，各收容所容纳300至600名难民不等，男女分开居住，最大的一间屋子可容150人。各收容中心供应的客饭，每天一日三餐最高时近三万份。每到用餐时，临时厨房外就会排上数百难民。“由于人多，每顿饭要分3批吃，通常要等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吃上饭。”犹太难民赖尼希回忆说。

最初，犹太难民很难找到正式工作，他们



▲上海虹口的犹太小学



只能到处打零工，干些杂活糊口，如送煤球、修电器、卖报等。稍事安顿之后，大部分犹太难民选择居住在虹口提篮桥一带，与中国居民杂处。这里物价、房租低廉。当地居民虽大多属于社会底层，但他们为犹太难民让出房子、介绍工作，甚至教他们生煤炉等。逢年过节，原住民不时邀请这些异乡客一起聚餐。

初来乍到，犹太人很快就展现出经商的天赋。犹太难民在提篮桥一带开办了咖啡馆、餐馆、杂货店、药房和酒吧，舟山路逐渐发展成为商业中心。迈克尔·布卢门撒尔13岁时随家人逃亡上海，他曾在这片犹太难民区里卖过面包，居住达8年之久。战争结束后，他去了美国，20世纪70年代，出任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。

有的犹太人依靠变卖家物维持生存，如酒杯、盘子、肥皂等，久而久之，公平路、唐山路、长治路一带，形成了一个犹太旧货市场，很多中国人去买。犹太难民先后创办了德文报纸、电台、学校、文学社团等，俨然独立王国。他们把霍山路上百老汇戏院的屋顶租下来，约700平方米的屋顶被装饰成露天花园，犹太人经常在此聚会、举办音乐演奏会等。屋顶花园甚至举办过一次上海小姐选美竞赛。

随着文艺活动的丰富，提篮桥一带渐渐被称为“小维也纳”。犹太难民的到来，传播着艺术的火种。在3万多名犹太难民中，威登伯格曾是柏林歌剧院第一小提琴手。来到上海后，他以教中国学生拉小提琴和弹钢琴维持生计。他的学生中，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音乐界的名人，担任过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就是其中之一。那些跳动的音符见证了一个流亡者苦中作乐的悲情。威登伯格生活虽然清贫，但他教学生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一律只收1元钱。他坐三轮车也给1元钱，不管远近，通常三轮车费只要几毛钱

就可以了。

足球是当年犹太难民们最喜爱的集体运动，他们拥有自己的球队、球星。年轻人成立了自己的足球俱乐部，周末与平均年龄为30岁的“老年队”比赛。当年小有名气的“巴塞罗纳队”与“上海犹太早报队”，名称来源于上海犹太咖啡馆和犹太报社。犹太联队甚至和中国国家队较量过。犹太球员修伯斯坦对中国球王李惠堂的球技佩服有加，后来称其为“贝利之前的球王”。修伯斯坦在上海踢球的近10年间，只击败过李惠堂一次，比分为3:2，但接下去的一场被李惠堂以12:3大比分反超。

### 日军强令犹太人迁入虹口隔离区

当纳粹德国在欧洲疯狂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时，他们的魔爪伸到了上海。1942年7月，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·梅辛格上校来沪。作为党卫军军官，梅辛格曾担任波兰首都华沙治安警察指挥官，绰号“华沙屠夫”。

梅辛格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了屠杀犹太人的“上海最后解决方案”：趁犹太新年节（公历9月）之时，在犹太教堂逮捕所有犹太人，用几艘旧船将他们运至东海，然后任其在海上随波漂流，饥渴而死；要么强迫犹太人去黄浦江上游废弃的盐矿做苦工，使他们劳累而死；或者在崇明岛上建立集中营，在营中用犹太人做医学试验，使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。

由于走漏了风声，“最后解决方案”引起上海和世界犹太人的强烈抗议，日本当局并没有采纳梅辛格的建议。到1943年2月，日军还是向犹太人下手了。他们在虹口建立了“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”，强令3个月内，1937年以后来沪的无国籍难民必须全部入迁，总数近2万人。

## 上海是一扇为犹太人开启的窗

在上海，犹太难民并没有被压垮。1945年，德日法西斯先后投降，犹太难民终于苦尽甘来，9月3日，隔离区撤销，他们重获自由。从1933年到1941年，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。上海一个城市所接纳的犹太难民，其数量超过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南非和印度犹太难民的总和。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的原作者肯尼利曾感慨：辛德勒救了1100人，而上海拯救了数万人！

随着战争的结束，当年的犹太难民如潮水一样从上海退去。他们成立了各种联谊组织，如美国的“上海犹太居民联谊会”、“黄包车联谊会”，以色列的“前中国居民协会”等，定期举行联谊活动，还出版各类刊物，缅怀在上海度过的求生岁月。

1999年，德国总理施罗德访问中国，他给上海留下了这样的感言：“一首诗曾说：‘死亡是从德国来的使节。’我们知道许多被迫害者在上海找到了避难处。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。今天，我们在此向那些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们，表达我们的感激与敬意。”同样，在以色列，有一座纪念碑上面写道：中国人，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恩！

位于长阳路62号的摩西会堂，当年曾是许多犹太难民抵达上海的第一站，如今作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，诉说着犹太难民在上海获得新生的过往。上帝关上一扇门，总会打开一扇窗，上海就是这一扇为犹太人开启的窗。在一次纪念活动上，犹太难民幸存者罗莎回想起被拯救的苦难历史，禁不住老泪纵横，她激动地说：“犹太经典上说，拯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一个世界，我想说上海就像拯救了宇宙一样。”

〔本刊责任编辑 柳婷婷〕

〔原载《文史参考》2011年第20期〕

“虹口隔都”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，鸽笼一般狭小的弄堂里，挤满了约2万名欧洲犹太难民。当地还居住着约10万中国居民。隔离区周围有铁丝网架着，进出口由日本兵把持。中国居民可以自由出入，犹太人则要向日本兵敬礼，拿出身份证检查，有时还要被搜查携带的东西。这些难民的护照上都印有“J”字标记，用以表明他们的犹太人身份。一个名叫合屋的日本军官因手握颁发出入证的大权，狂妄地宣称自己为“犹太王”。为便于管理，日本人在隔离区里实行“保甲制”。他们将年龄在20岁至45岁的犹太男性编入名册，让他们轮流执勤，自行管理。

隔离区内，犹太难民生活每况愈下。“我们这一层里的16个人只有一个卫生间，顶楼另一个卫生间12个人共用。”犹太作家伊·贝蒂·格列宾希科夫在自传《我曾经叫莎拉》中回忆道。由于美日交战，美国犹太人对上海犹太人的援助资金一度被冻结，隔离区内，能领到伙食的难民数从八千名削减至四千名，一天有时只能供应一餐粗糙饭食。有些犹太难民为弄几文钱买干酪，到中国人的磨坊里推磨，甚至沿街乞讨。

虹口“隔离区”一带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：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，一度被日本人在出口焊上铁栅门，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，被困在弄堂里的两千余人，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原来，居住在周围的上海民众，以“空投”方式，将面饼等食物掷过去而救助了他们。

1945年7月，美国飞机误炸虹口区，31名犹太难民死亡，500人受伤，700人无家可归。邻近的上海居民，虽然同样伤亡惨重，仍奋不顾身冲入火海，在瓦砾上抢救伤员。他们把帆布床、垫子、水桶送到主要由犹太医护人员组成的急救站。犹太难民则迅速组织一支护卫队，防止有人趁火打劫。